

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 学科视野与问题意识*

□ 陈明明

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是历史学与政治学科际整合的体现之一,既吸纳了政治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的学理资源,又经历了新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动员,对于理解和解释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本文从历史与政治、规范与经验、文化与权力、时间与结构、逻辑与证据五个方面讨论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学科脉络、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

关键词 政治史 文化 权力 时间 结构 逻辑

作者陈明明,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上海 200433)

DOI:10.14167/j.zjss.2017.09.007

一、历史与政治

在古典公共生活研究中,政治与历史是不分的。亚里士多德比较古希腊不同城邦社会及其体制之优劣的《政治学》、马基雅维利讨论罗马共和国创建与暴力专权关系的《论李维》,熔政治与历史于一炉,向来被认为既是政治学的经典,也是历史学的名著。在中国,“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直是历代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的不朽格言,说一部《资治通鉴》是治国理政的最好的MPA教材,亦绝非虚言。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历史讲述的不过是政治的故事,政治上演的其实是历史的剧目,政治与历史的前世姻缘,落实到言说和书写上便是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正如布伦纳说,“任何纯粹历史的问题意识都从属于政治史。所有的历史就其严格的词义而言都是政治史。”

不过,近现代以来,随着学术体制的发展和形成,此前并无学科分野之讲究的政治史研究逐渐

被人们归入历史学领域,虽然政治史担着“政治”二字。政治史研究的科际归属所以具有历史学的身份,首先是因为历史学是一个源远流长的阵容强大的成熟的学科,而政治学作为从历史学(以及伦理学和哲学这样的传统学科)分离出来的一个新兴学科,不过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在历史学家那里,本质上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所谓政治史即政治的演进史,在内容上多归为君王史、宫廷史、帝国史或统治史。直到民族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立尤其是科技革命和大众民主兴起之时,这种政治史等于历史的局面才有所改观。正因如此,20世纪中期以后政治史研究面临的巨大挑战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来自政治学而是来自历史学内部。其中,历史学年鉴学派倡导的人类生活总体史研究成为强劲的主流,在这一主流推动下,关注下层日常生活的社会史研究由此兴起,以国家典制和精英活动为主线的政治史研究范式开始动摇。不仅如此,70年代以来,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地方国家制度的一项非常试验”(12JJD840001)的阶段成果。

挟后现代主义之力,史学的另一支新旅——新文化史也逐渐大行其道,同社会史一起,进一步分割和夺占政治史的领地。所有这些都是历史学内部的“抗拒与变迁”的双重变奏(借用艾森斯塔特的现代化叙事之说)。不无有趣的是,这种抗拒与变迁客观上给政治学的进入提供了机会——史学界许多学者指出,社会史、文化史的“碎片化”和“地方化”的叙事,毕竟代替不了政治在跨地区(整体上)和跨领域(制度上)层面的基础性综论,社会史、文化史的“专业化”和“去中心化”的取向也无法割除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同政治结构的相互依存关系。人们发现,政治史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政治本身的问题,而恰恰是意识到政治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具有支配性的变量,如何通过运用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将之引入“历史的秩序”和“秩序的历史”中来思考和处理的问题。

事实上,在重构政治史的呼声中,政治的维度在新兴的研究题材中得到了关注和强化。历史学者承认,无论是社会史还是文化史,民间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诠释还是要放到基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差异而形成的权力关系中来考察;像诸如身体控制、集体记忆和对不同事物感知的研究,也渗透着对于不同的权力运作机制的关注。也就是说,在政治史面临挑战的同时,政治作为一个理解多种历史题材的意义的透镜,仍然发挥着不同寻常的作用。这正是政治史得以重整旗鼓的基础和契机。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行为主义影响的扩大,政治史研究也开始力图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对过去的政治活动做出解释。政治史进行自我调整和革新,既吸收社会史的自下而上看历史的视角,也接受文化史的把人在政治领域的“内在经验”视为重要历史事实的取向,自身经历了从传统政治史向新政治史的转变。这个转变意味着,政治史研究不仅是属于历史学的,也是属于政治学的,不仅是行动于历史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学科分支,也是统一于历史学与政治学之中的研究领域,体现着历史学与政治学的科际整合。这种科际整合从根本上来自政治与历史的传统的天然的内在联系,英国历史学家 E.A. 弗里曼如是说:“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当前的历史”。事实上,在政治学中,无论是马克思的阶级革命理论、韦伯的合法性理论,还是摩尔的民主

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蒂利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直至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等分析,都是以探寻历史进程的方式对事件和行为作出合理解释,试图打通政治、经济、军事与意识形态壁垒的鸿篇巨制。政治史成了历史学和政治学珠联璧合的典范。显然,关于历史学和政治学的关系,另一位英国史学家 J.R. 希里说过的一句话也相当深刻:“没有政治科学的历史无果,没有历史的政治科学无根。”作为现代科际整合运动结果之一而兼具政治学与历史学双重品质的政治史研究,由于附丽于源远流长的治学传统,吸纳了政治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的学理资源,又经历了新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动员,它对于当代社会政治问题研究,尤其是理解和解释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而言,日益显示出广阔的前景。

二、规范与经验

社会科学研究有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两种路径和取向,政治学尤其讲究二者的分殊,并随潮流所向,近年愈加偏重后者,即偏重对政治行为的观察调查、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模型建构。政治史研究在处理其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中,若要维护自己的学科自主性,同样也有一个调整和界说自己的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问题。

比较而言,政治史的规范研究更多保留着传统史学的特质:一是强调一切历史终究无法脱离政治的内涵或属性,政治即或不是历史的全部,至少也是历史的内核,这个内核隐含着历史何以如此的某些重要假设;二是重视治史的社会政治功能,历史研究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既有认识论的需要(探究内因),更有实践论的使命(经世致用);三是具有浓厚的叙事风格,其学科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历史事件的纪实性叙述(史料按时间顺序组织起来,内容构成前呼后应的故事),“历史学的根本使命是叙事性的。它叙述人类社会的古往今来,这些历史的基本事实是独立于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客观实在。”如此,政治史的规范研究就格外关注对历史逻辑、历史进程、历史价值和历史归宿的揭示、论证、演绎和建构,试图给出所谓历史通则的普遍性理论,如黑格尔的自由意志展开的世界史观、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

的唯物史观、斯宾格勒的比较文化反思的西方没落论、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的文明兴衰论、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世界体系论、福山的自由民主制度胜出的历史终结论,等等。政治史的规范研究现在多被人们批评为“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指其以人为建构的历史观念来引导和规范具体的历史叙事,并使之产生意义,属于一种历史哲学。它的全景式的研究风格也被认为与追求历史的专业化、多元化和差异性的学术主旨相抵触。的确,以往的政治史的规范研究存在着忽视历史的差异性、多样性的倾向,使历史失落于预定论和目的论的陷阱之中,但是,人类的历史有没有一致性和统一性,历史的发展有没有隐藏其后的法则,并因这种法则的作用而显现出历史演进的某种方向,始终是一个令研究者兴味盎然、无法割舍的话题。退一步说,如果没有总体历史的宏观视野,没有某种哲学理念(历史观),没有某种历史观为具体的研究选题确定边界,概言之,没有把具体的叙事和总体历史联系起来的努力,人们能不能从纷繁复杂甚至混乱不堪的“发生过的事情”中通过审查和考辨而到达“澄明之境”,从而满足人的理性(合理化的解释)和认知(普遍性知识)的天然冲动?如果不能,那么无论历史被赋予何种意义,实际上不过是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发展命运的与生俱来的深切关怀。

政治史的经验研究不过是实证研究的另一种说法。经验研究与实证研究大体可视为一回事,但二者的语义略有差异,前者强调的是研究工作以观察为基础,后者讲求的是事实与推论的合理关联。就治史的本质而言,政治史对实证研究的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社会科学,所不同的是它的实证研究主要不在于“共时性”的经验观察、比较与验证,而在于“历时性”的对文献、口述、档案等历史记录的梳理、整理、鉴别和考证,正所谓“不远万里地访史,不弃涓流地存史,不辞细微地证史,以便能留下一部经得起后人推敲的真实的历史”,在风格上表现为近年来逐渐兴起于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并日益成为时尚的实证主义,在作品上则表现为强调和依赖以口述史和档案史料为基础的个案研究,以及由经济史催生而来的利用数据分析技术研究历史的量化史学(cliometrics)。毋庸赘言,这也是对以上所说的“宏大叙事”进行反思带

来的气象。如果说,政治学(政治科学)的实地的经验研究容易从问卷、访谈、观察及其采集的数据中获得结果,其研究内在地充满着一种理论建构的冲动,希望其经验研究能形成所谓科学的一般结论(事实上推论多半不易形成,或推论的时效有很大限制——或及于一个地区,或及于一个群体,或及于一个时段),那么,兼具历史学和政治学双重特征的政治史的“经验研究”通过对积存的和搜集到的大量文献史料的阅读与整理,以及加上透过口述访谈乃至亲身经历而获得的“史感”对文献史料(比如档案)的鉴别和辨析,较之政治学其实更有条件形成若干推论。只是因历史本身的原因(发生了就消逝了)不容易验证其假设,故在一些学人那里发展出了一种“把历史讲清楚就行了”的消极品格,主张完全用材料说话,没必要下这么多的结论,认为“最好的历史作品应该完全是讲故事”。其实,对政治学者来说,好的政治史研究不仅应有可靠的史料为坚强支撑,还应有强烈的理论关怀——正是后者使政治史研究和一般史学研究有了区别:为了让形成的假设或理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普遍性,政治史研究可以通过拉长时间和扩展空间,使建构模式或理论的机会增加,以扩大研究的成果。

在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中,不论是基于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目标,还是基于以社会为中心的学术旨趣,关注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意识形态、政党动员、国家构建和治理机制;重视不同阶级、阶层、集团的政治经历以及政治对不同人群经历的影响;关注重大事件及其结果,强调事件的背景和变量的关系;观察社会组织、职业群体、宗教文化、心理习俗等历史表象之下权力关系的形成和运作,以寻找历史因果关联的方式对事件和行为作出解释(explanation),或以解读历史面相的方式对过程和行动做出诠释(interpretation),概而言之,利用历史资料来提出政治学的问题,或利用政治学的概念、理论去处理历史问题,可能是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基本要求。

三、文化与权力

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可以有不同的视角(perspectives),所谓视角总体而言是一个看问题的立场,它服从于研究者对问题性质的判断和研

究项目的设计,以及研究者的学术旨趣,当然也包括“如此方可获得更好的观察与解释”的主观预设,视角不同,问题就赋有不同的语境。文化与权力就是政治史研究中常见但并非轻易用得好的一个视角。

众所周知,在政治生活中,社会资源的配置总是通过权力显现出来的,表面上,权力依附于组织、机构和制度,但权力的发生、运行和对权力的服从,背后都有一个文化机制的问题。过往的社会进程多半是通过事件表现出来的,特定的历史人物在特定的历史事件中,利用文化来回应组织、机构和制度的压力,既创造新的文化(行为方式),也为组织、机构和制度的变迁提供了动力。这正是从文化角度理解政治过程的魅力所在。它实际上是说,文化不仅是竞逐权力的处所,也不仅是接近资本的工具,还是权威与合法性产生、表现和兴衰的发源。例如,关于20世纪前半期国家对地方资源的动员和控制能力的研究,有不少理论如冲击回应理论、公共组织角色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精英(士绅)理论、阶级斗争理论等等都试图对国家何以失败提供合理的解释,在这些解释中,晚清以来的国家由于长期消耗于战争和叛乱而无法有效向下扩张自己的权力一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国家真的被基层社会阻隔在大门之外了吗?杜赞奇以华北农村为例,指出国家(继承了晚清新政的民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乡村社会,国家的失败并非败于其扩张缺乏政治行政力量的支持,而是败于其扩张缺乏文化的根基。这就是他的“文化网络”理论:“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文化网络既控制着各种资源,而其本身又包含各种感性特征,所以,它成为乡村社会中各种势力激烈角逐的大舞台——争取使网络中的舆论导向和权威为某一特殊的需要和利益服务。”文化网络由此成为乡村居民与外界联系的纽带,也成为先前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渠道,并在此过程中把国家政权和地方社会融进某个权威系统(比如祭祀系统)。在这项研究中,杜赞奇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观点:20世纪前,国家

政权是容忍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的,国家依赖文化网络的组织、规范(体现为“保护型经纪人”)来维持乡村秩序;20世纪后,国家逐渐放弃并破坏了文化网络的一些组成部分(以“赢利型经纪人”代替了“保护型经纪人”),从而放弃和破坏了原本通过“保护型经纪人”实现的国家与民众的文化联系。当国家放弃利用或摧毁文化网络而又未能建立新的沟通渠道时,国家的扩张能力(建立新组织的能力)被削弱了。^①这是关于20世纪中国国家建设失败(所谓“内卷化”)的一个讨论。它当然不会也不应排斥社会经济(产业、货币、资源禀赋)、制度(法律、财税、官僚、央地)、环境(周边关系、国际关系)等分析视角,但对政治史研究而言,文化与权力的进路的确比较容易使人触摸到政治隐秘而复杂的经络。

当代中国政治史是由革命、建设和改革三部曲组成的,其中,50、60年代的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早期开始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延伸。或者说,早期共产主义革命是建国后革命与现代化的前史。关于这个前史已经有很多研究了,然而,仍然有一些话题常说常新。例如,中国革命的精神故乡——苏联在七十年之后轰然坍塌,革命成为记忆中遥远的过去,新中国在即将迎来七十华诞之际已成为全球化的引擎,革命的经验与传统为什么仍然受到关注?问题再小一点,很多人注意到,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的模仿创新是中国革命发展壮大的关键要素,那么在当时和现今,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把激进的革命观念引入基层社会以及采用什么方式发动群众?这又可以追溯到一个更小的问题: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人如何在与自己全然不同、文化程度低下且穷困潦倒的工人农民阶层中培养出大批忠实的追随者?裴宜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解释。通过讲述20世纪20年代安源罢工的故事,她揭示了成功的革命与共产党将文化资本转化为承载具体功用的革命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安源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源头之一,安源既是工业的,也是农业的,既是工人的,也是农民的,前者契合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主题,后者则给出“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背景,知识分子(李立三、毛泽东、刘少奇)去安源播火,象征着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历史,而如何

播火则体现了利用一系列符号资源在底层大众之间培养新的集体身份认同的过程——裴宜理称之为“文化置位”(cultural positioning)。^⑭文化置位是一种动员方式,把民间大众活动、戏曲传说或宗教、类宗教仪式诸多元素加以创造性应用,使“外国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人们熟悉的渠道进行有效的交流和传播。这种动员方式在革命各个时期都广为使用,即使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声称与传统文化决裂的年代,国家掀起的对刘春华创作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狂热的顶礼膜拜,和李立三把民间习俗仪式加以改造使之成为革命目的服务别无二致,都在于通过使观众油然而生“类似于宗教皈依的情感体验”而把“大革命”推向高潮。^⑮就民间文化资源的利用而言,它和杜赞奇的文化网络是相通的,不同的是,后者因统治者的无意放弃而导致国家政权的被削弱(杜赞奇认为这是20世纪前期国家的严重“失误”),前者因革命者的有意运用而导致造反力量的积聚(裴宜理认为这是共产革命兴盛的关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中叶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如上所述利用了某种传统文化心理机制,但国家对传统文化不分精华糟粕的大规模的极端清洗(“破四旧”),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借助了强大的组织的力量,却未能开发出相应的赋予组织权威性的“新文化”,文化的贫困导致了国家统治的贫困,使得国家最终不得不在1978年开始了历史性的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一场政治的“脱贫”运动。

政治文化论者很早便指出,作为一个共同体长期博弈积淀而成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文化对共同体成员的行为具有强制性的作用。^⑯换句话说,性格决定命运,态度决定行为,态度类型就是文化,即作为认知、表达和评价取向背后的信仰、信念、价值、感情和心理结构体系。当然,文化的“强制性作用”表现为对个体行为和集体行动的诱致性引导,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它的发挥通常不是直接的而是需要转化的。如果说,文化为政治认同提供心理机制,权威离不开文化支持,行动离不开文化动员,统治离不开文化操控,那么文化的确为观察、理解和解释政治提供了一把合适的钥匙。例如“韧性威权”这个近年热行于比较政治学关于中国当代政治体制研究的概念,从市场制度、中产阶级、社会结构、政党学习能力等方面的理解都有其

价值,但从文化上揭示政权稳固性可能更有深度。“中国共产党具有创造性地运用从本国丰富的历史传统而来的各种象征性资源的高超能力。这种对象征性资源的娴熟运用使得整个政治体制在文化上与中国的民族主体形成共鸣。”文化的中国“显然为现代威权主义政权的韧性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参考经验”。^⑰裴宜理的这一观点和她在《安源》里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已故中国学者史天健在关于当代中国人民民主价值观的实证研究中讲中国人想要的民主和西方意义的民主大相径庭,其实不过是孔孟民本思想的现代表达,而正是这一点支持了“要民主”的民众对“要民生和秩序”的政府的认同性评价,则完全可以看作是“韧性威权”在文化上的根基。^⑱

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对此已有很好的论说与发挥。不论是以上所提到的杜赞奇的“赢利性经纪人”与“保护性经纪人”、裴宜理的“文化置位”与“文化操控”(cultural patronage),还是因篇幅故无法在此展开的费孝通的“双轨政治”、黄宗智的“集权的简约治理”、艾森斯塔特的“无形政府”等等,都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土社会、地方治理和国家建设的特质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解释。这也让我们想到,在当代中国,5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反右运动、大跃进,60年代的“五反”“四清”、文化大革命,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这些具有历史路标式的社会政治运动,仅从党国政治的组织、体制来观察是不够的。权力的发轫和施加是一个方面,权力的接受和转化是另一个方面,没有后者,权力的链条便中断了,文化正是可以帮助我们解析后者何以发生,又如何形塑前者,两者又是通过什么连结起来的密码。由文化和权力的视角观察这些问题,我们才能走入历史的深处。

四、时间与结构

时间是历史的基本变量,没有时间便没有历史。“不深入理解时间,你将会是糟糕的政治科学家,因为时间是观念、制度和信念演变的界限。”(诺斯语)^⑲作为历史进程的物理刻度,时间的标识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历史是在时间中展开的,人类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纪年方法,是为了表示历史事件的先后次序,是为了记住历史和理解历

史。但时间的标识不仅是出于把握历史的线索以免历史陷入杂乱无章的叙述功能之必需,更重要的是因为时间的标识具有深刻的政治认知意义,即时间和不同政治体系的法统及合法性存在着内在关联。

以1990年的《金门协议》为例。这年的7月22日和8月13日,发生了两起渡海入台的大陆同胞被台湾当局强行遣返而导致46人死亡的事件。在舆论的压力和大陆的推动下,两岸红十字会在金门举行会谈,磋商两岸居民往来的规范、处理方法。围绕会谈主体名称、遣返对象提法、遣返地点,乃至文本落款格式等技术细节,双方几经反复,破除僵局,终达成协议。正待大功告成之际,不料横生枝节,分歧竟出在本应最不成为问题的时间落款上。台方提出用他们习惯的年号,大陆表示绝对不能同意,循通例当然用公元年号。台方见状复建议用农历年号,说今年是庚午年,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大陆认为不妥,一甲子60年,转一圈后不知是哪一年,世界看不懂,还要换算,即使用农历年号,纪年用农历,月日用公历,亦属不伦不类。几经相持,台方终于同意“中华民国”几个字可省略,但后面须写七十九年,称此为底线,不能再退。最后,《金门协议》的时间落款只好各写各的:台湾方面的日期落款写“七九年九月十二日”,大陆方面写“九〇年九月十二日”,向媒体发新闻稿统一用“本年九月十二日”。^⑩

这是一个时间被政治绑架的例子。在中国历史的撰述中,时间(年代)的政治含义的确是个大问题。这主要体现为关于“正统”的讨论,即应该用哪一朝、哪一位统治者的年号来纪年。中国人对时间的政治感历来很强,周易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乾坤扭转,犹如四时轮回,是万物兴替的自然规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则表达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历史循环法则。到了现代,一句“时间开始了!”(胡风语),则是中国19世纪被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最终又成功地在20世纪超越现代世界体系的政治宣言,本质上和基督教的“千年王国”降临、福山式的“历史的终结”有异曲同工之妙,反映了时间在新式革命中的丰富的含义。

在当代中国政治史上,时间的政治意义首先

表现为“新”对“旧”所拥有的历史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是由“历史必然性”赋予和论证的,反映了“新比旧好”的一种哲学理念。在这里,进化论的物竞天择是通过时间表现出来的,趋新弃旧成为政治论证自身合法性的特征,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到共产党的“新中国”、“新社会”、“破四旧、立四新”,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等等,都是20世纪政治的强大话语,本身也是政治过程演进矢量的体现。其次,新旧时代的时间标志着新旧世界的结构的对立抗衡。新旧时代的时间是断裂的,其断裂在空间上表现为两个世界,两个世界有不同的结构组合与运行法则,新世界对旧世界的胜出要求新法则取代旧法则,要求新世界的生活者要和“旧我”告别,即把他们在“旧日”习得的行为规范彻底弃除。革命的合法性由此植入。由于哲学上已经建立起“新比旧好”的文化,这种弃除虽然经历痛苦的思想斗争,却没有遇到强大的抵抗。第三,在革命与现代化的语境下,时间具有稍纵即逝的紧迫性,“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折射出领导这一伟大事业的主体的历史焦虑。对时间的强调,导向了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全面实行。中国的工业化战略是“浓缩”时间以追赶和超越现代世界体系的典型案例。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不仅是经济上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而且是社会政治上的“新的社会新的人”(陈伯达为人民公社撰写的社论题目)的改造行动,它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形态和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外,从时间的维度指出发展方式随时间变化而展现不同的特征不是没有意义的。埃特曼在《利维坦的诞生》里谈到,欧洲大陆国家制度的差异不在于有没有地缘政治竞争,而在于地缘政治竞争的开端并非同时发生,这种“非同时性”(non-simultaneous)的历史意义,一是使得国家在利用既有资源方面所面临的条件、限制、压力和支持以及主观意愿千差万别;二是造成国家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与人事部门职业化的供给各有不同;三是给予国家组织建构深刻影响的地方冲突先后不一,而支撑国家的流动资金、税收和财政管理的建立及效能又相差悬殊。这就导致大革命前夕日耳曼诸国和不列颠成功建立起现代早期的官僚制结构,而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却发展出各式各

样的世袭制结构。^①这种关于国家的发展路径同国家在初始状态(时间)的约束与回应具有内在联系的观点,一如皮尔逊在《时间中的政治》中所说,实际上是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理论:“路径依赖的主张通常指出,开端是极为重要的。……理解自我强化的过程,对于探究大量关于时间性的议题,是极为有用的。”^②因此,讨论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需要回到初始时间及其内化的结构,即要注意到历史某个时刻初创的制度,因比较因素的诱导和启示,会强化制度的运行轨迹而排斥了其他可能的选择。例如,新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放弃原本要经机械化再到集体化的社会发展战略(新民主主义),仅用3年时间便发起了社会主义改造,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20世纪地缘政治的初始条件及其影响可能更为重要,毕竟早期的现代化国家(如英国)并没有遭遇强劲的竞争对手,而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却面临强大的政治军事安全压力。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变革中寻求赶超型发展的动力,在经济和人力资源(识字率和管理人才)匮乏的情况下,可能也是不得已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一旦同历史上在恶劣条件下依赖政治权力的运用而成功实现组织战略目标的经验和记忆联系起来,就会变得不可遏制而日益固化为政治能动主义的成规。政治能动主义被特为“变劣势为优势”的屡试不爽的药方,结果导致计划体制的实行充满了“大搞群众运动”和“政治挂帅”的激情,因而又使得中国的体制结构呈现出不同于苏联专家治国体制的粗放经营和命令主义的特点。这种粗放经营和命令主义本质上是对计划的破坏和反动,于是,当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红利”被“自我强化过程”逐渐耗竭并经文化大革命最终一击之后,人们不难理解,中国反而能比实行严格计划体制的苏联更易放弃计划体制、更易启动市场化的改革。

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两个变量,时间和结构的互动构成了一种观察和理解政治变迁的方法,邹谠先生称之为“宏观历史与微观机制”,它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结构主义的分析框架。在邹谠看来,宏观历史是一个结构——历史本来是一个时间概念,但当历史被拉长和放大,空间就植入其中,从而表现为时空结构,其内容有国际关系、民族关系、阶级关系、经济关系、财产关系、政治关

系、文化关系,等等。微观机制则是人在宏观历史约束下的能动的选择,表现为具体的历史、策略的历史、博弈的历史。邹谠用宏观历史表达结构的意义,是想说这种结构不过是人们集体行动的产物,是社会上无数人之间策略互动的结果。既然是集体行动的产物,当然可以最终通过集体行动来改变。结构(宏观历史)与历史(微观机制)的关系有这么几层含义:(1)结构的约束或强制只有通过行为主体的策略互动才能感觉得到,也只有通过策略互动,才能影响历史和塑造历史。(2)当结构被内外因素扰动时,比如社会经济结构被内部的人口增长、移民、经济波动、自然灾害等因素冲击时,或被外来的军事入侵、外交失败、文化殖民、主权危机等因素压迫时,人们会采取新的策略互动形式,形式之一就是社会革命。(3)革命意味着结构的重组或转换,维持原有结构的权力平衡开始被打破。(4)要重组或转换结构,行动者就必须认识和评估结构对行动者的选择所施加的约束的性质、强度和特点,并使自己的选择与这种约束相适应。适应结构是重组和转换结构过程的一部分。(5)结构为人的选择设定了某些不可超越的界限,但人通常不知道界限在哪里,所以往往会有激进主义的突进,也正是因为有界限,所以竭尽全力经碰壁以后才能面对现实。在关于中国革命再阐释中,他试图从中国的个案概括出一个普遍性的命题,即政治行动者的正确选择导致了宏观历史的变化,或者说导致了结构的变化,这些选择就是微观机制,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新过程、系统化过程和策略互动过程。^③这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叙事框架。

马克思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④把时间等效于空间,意味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时空统一性,即历史和结构的统一性。换言之,作为历史主体的集体行动的产物,结构表现为行动规则或规则要素的组合与排列,是从时间(历史)中产生的,时间(历史)是规则或规则要素的源头,也是规则或规则要素赖以发挥作用的形式。新旧时代标志的新旧世界都是一套规则体系,它们在某个“历史时刻”产生了,就对历史中的人们发生影响。例如1952年的院系调整,1953年的统购统销,1956年的合作社运动,1958年的“一元化”小

组体制,1967年的革命委员会,1975年的宪法,1979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的村民自治,等等,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史上打下鲜明时间印记的大事件,都凝聚了特定历史中的人物、职业群体、阶级阶层、组织机构,对时间(时代)的特殊认识、理解和选择。结构是带有规则性的人类行为模式,结构舍弃了许多具体的特殊的现象,和优先关注具体历史发生的传统的历史学观察和研究存在一定紧张,因此,要避免陷入琐屑的叙事,又要避免脱离人物动机和事件的结构主义,就需要依赖史料,利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观察历史上的社会政治,关注历史事件的具体发生过程,把时间和结构结合起来,解决当代中国政治史的发生学和诠释学的问题。

五、逻辑与证据

在历史研究中,逻辑有几种含义,其一是指所谓历史本身固有的法则,即历史运动的本质和规律,通常被称为历史逻辑;其二指历史在理论思维中的反映和再现,即以理论的形态对历史法则的概括和阐释,又被称为历史的哲学逻辑或理论逻辑;其三指关于历史的认识、理解和表达的一套方法,包括概念、判断、推理等思想形式的知识,也被称为形式逻辑。这里讲的逻辑,主要是二者即理论逻辑,表现为历史的研究过程和叙述方式。

恩格斯以经济学史研究为例,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评论中指出:“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

点上加以考察。”^②这是一段人们广为引用而存有不同理解的话。如果不是纠缠于具体的文字,不是局限于哲学概念的辨析,恩格斯表达的关于逻辑范畴和历史进程的关系,其实超越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思维与存在、抽象与具体的思辨,对历史学的“历史”把握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第一,逻辑与历史是统一的,逻辑作为历史过程的抽象,摆脱了历史的偶然性和表象的干扰,触及到了历史的主脉,反映了历史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所以就研究而言,逻辑的方式也是历史的方式。第二,逻辑与历史是有差异的,逻辑来自对历史的内在结构的审察,并不受制于历史的时间顺序,因此逻辑的东西不直接等于历史的东西,逻辑揭示的历史关系(如“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有时甚至“同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③第三,正因为逻辑与历史是统一的又是有差异的,故不能用逻辑代替或剪裁历史。宏大叙事的缺陷在于以逻辑强制历史:历史跟着逻辑走,为逻辑穿衣,为逻辑礼赞,结果沦为没有历史的空洞的形式逻辑。但反过来,以后现代多元叙事的叙述结构强调历史的不确定性、差异性、未完成性,以历史不确定性否认历史的规律性,以历史差异性替代历史整体性(乃至导向“碎片化”的研究倾向)同样也是有缺陷的。显然,没有逻辑的历史是无根的历史,没有逻辑的历史是杂乱无章的史料堆积。我们应该做的事是让历史展现出逻辑,用逻辑来说明历史,使逻辑融通于历史,为理解历史提供“制高点”——站在高处看风景,但不要忘了风景深处包含着无限的差异和丰富性。

在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中,逻辑的把握是相当重要的。人们都注意到,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经历了一个权力集中的过程,新中国建立以后,集权政治成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显著特征之一,这不是说此间没有分权的历史事实(如1958年和1970年的行政性分权),但在政治的演进过程中,集权无疑构成了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如何理解这一走向则须借助理论或逻辑,在政治史研究中,它实际上以一系列旨在揭示或解释因果关系、约束条件的概念、话语和所谓机制表现出来,如威权政治、党国政治、革命后社会、动员体制等。以党国政治为例,有三个逻辑规约着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其一是现代国家建构的

逻辑。自晚清以来,中国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便开始了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现代国家要求国家的权力必须下沉至基层,把社会组织起来,以回应现代世界体系的挑战。党国政治便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选择。其二是社会革命的逻辑。主导现代国家建构的政党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把现代国家建构同“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通过社会改造,剪除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推动生产关系公有化品质的提升,建立新的社会结构,最终确立了国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垄断地位。其三是后发国家工业化的逻辑。现代国家建构需要强大的工业化作为支撑,社会革命需要强大的工业化作为其合法性证明,在国家积贫积弱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除了运用高度的政治权力来集中和攫取农业剩余外别无他途,工业化运动于是变成了大规模的政治动员运动。格尔申克隆很早就揭示了落后国家工业化与权力集中的内在关系,^⑤中国高度集权的体制则提供了一个例证。除此之外,如果再仔细观察中国的集权体制及其政策,会发现这个体制对民生和治理有很强的偏好(虽然发生过重大的失误和危机),民生和治理又通常纳入集权体制的维护和强化战略中。因此如前所述从文化上来理解权力的集中不是没有助益的,一个内向型农业定居社会对圣贤、明君、清官、仁政、盛世的向往,支撑了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它本质上是大一统的思维,这种发生于秦汉时期的思维,经士人的演绎传播,遂成古今之通谊,天地之常经,作为一种文化深植中国大地,成为中国人政治行为的基本约束,也成为现代动员型体制的文化逻辑。^⑥这四个逻辑的相互展开彼此援引塑造了中国的党国政治。如果没有把握住这些逻辑,当代中国政治史的重大关节与体制特征便无法得到有效的分析。

当然,逻辑与历史的讨论不可避免涉及另一个重大问题,即逻辑真实与事实真实的问题。所谓逻辑真实,指基于由历史内在相互关系决定的发展趋向与必然性而“本质呈现的历史”,而事实真实则指基于历史真正存在或曾存在过、发生过的事物而“如实呈现的历史”。和以上关于逻辑与历史的讨论类似,逻辑真实并不直接等于事实真实,但逻辑真实与事实真实的统一却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史所应关注和追求的目标。例如,中国计划经

济时期的社会生活长期依靠票证来保证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的平均分配,本质上是计划经济的短缺性特征决定的,这种短缺在逻辑上植根于计划经济对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扭曲,它是普遍的真实,但金大陆通过档案和方志(商业志、价格志)发现,在上海,从1964年6月1日到1976年7月15日止,猪肉的供应并未曾实行票证。这个结论一直遭到人们的记忆的质疑,金大陆认为这是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舛误”,猪肉凭票供给的票证记忆是被建构起来的。^⑦其实,票证的历史是一个逻辑的真实,上海的实例是一个事实的真实,我们要承认逻辑真实更本质地反映了计划时期的运行法则,否则改革开放的必然选择无从谈起,但也要看到逻辑真实并不能代替事实真实,否则历史研究便成为多余。如何消除二者的紧张,如何寻求二者的统一,需要回到历史现场细察其缘由。金大陆告诉我们计划体制对保障上海供给的政治考量(“全国保上海”)、上海农业对工业支援的政策规定(郊县生猪交售政策)、城市对养猪业的支持措施(饲料收集)等因素是如何造成了票证汪洋大海中“敞开供应”的孤岛,从而在逻辑真实与事实真实之间建立起合理的衔接。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在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中,对历史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历史进程中的逻辑真实应持有一种审慎的态度,“采用这个方法(逻辑——笔者注)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有的指出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现实历史进程,有的指出经济文献,以便从头追溯明确作出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定的过程。”^⑧这里当然是强调逻辑对于史证的运用和需求,但既然逻辑要回到历史,逻辑就不能摆脱历史的形式、多面性和偶然性,而努力忠实于历史的原貌。如前述杜赞奇的现代国家建设过程如何破坏国家在基层的权力基础,裴宜理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动员如何需要诉诸非无产阶级的符号资源,还有张济顺的1950年代的上海在革命史叙事中的沧桑巨变与社会史叙事中的波澜不惊之间的矛盾等,^⑨都显示了逻辑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从历史法则过渡到历史书写,黄宗智已经指出,“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既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相互背离的,他以土地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为例,说明“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

实”之间的相互脱节。^⑩注意到这种背离或脱节,历史的书写就会留有余地,历史的阐释就具有自我节制的品格。

政治学经常会问好的理论是什么?菲利普斯·夏夫利说,好的理论应满足“重要性、简明性和预测的准确性”几个标准,如果再多一点,还可加上“广泛而普遍的适用性”和“令人惊喜的发现”。如此“它就会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来简化我们对复杂现实的认知。这样的理论有时被描述为‘优美的理论’。”^⑪同样,政治史研究也会问好的历史叙事是什么?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回答:例如,好的历史叙事应是写作有魅力的作品从而拥有大量的读者(邱燕凌);或是挣脱社会科学范式牢笼、使人对人情世事的常识能进行深刻反思(汪正晟);或是秉持“存在的合理性”尽可能还原有血有肉的历史真相(张祖龙);或是除还原史实外,还须运用理论方法处理史料,作出批判性的解释(尤淑君);或更简单些,“最好的历史学就是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历史学”(裴宜理),^⑫如此等等。我以为,好的政治史应该是兼具理论与经验(史料)的政治史,是在理论逻辑和史料证据之间建立有机关联的政治史。

第一,它尊重而不盲从于宏大叙事,它承认历史是有规律的,而不是像后现代主义否认历史的规律性,所以它会重视对规律的考察和验证,重视从黑格尔、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到汤因比、布罗代尔、沃勒斯坦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并有比较地吸取所有有价值的学理资源。第二,它不排斥任何可帮助分析和解释政治史的方法技术的利用,也不刻意追求所谓方法技术的创新,在政治史研究中,方法是跟着问题走的,问题来自对现实的观察、对史料的阅审而产生的“疑思”(puzzles)。问题本身的性质,限定并提示了方法和概念的选择范围与运用方式。在史料面前,要问自己有什么新的发现,在发现当中,要问能产生什么新的问题,问题是否有价值,是否有普遍意义,能否形成某些假设,即或没有普遍意义,对它的研究能否提供新的视角、新的知识,然后才问如何处理,即如何书写和表达。的确,在政治学中,有的研究领域或研究主题(如选举和民意测量),离开特定的方法技术就不能有效形成可信的结论。但是,第三,在政治史中,对方法并没有如此严苛的要求,对史料做考

辨,给范围做限定,把理据讲清楚,将案例用适当,立论和推论有证据,事实和逻辑能自洽,是最基本的要求。而叙述的风格、布局的巧思、文字的优美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人而异,因才学、积累、训练和取向而异。总之,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来说,寻求思想和史料的妥善结合,逻辑和证据的有机关联,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在各种理论、范式和方法众声喧哗的今天,这种努力仍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注释:

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页。

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一章,竺乾威、周琪、胡君芳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刘军:《20世纪西方政治史学的沉浮》,《学海》2001年第4期;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李里峰:《新政治史的视野与方法》,《福建论坛》2009年第6期;李中人:《“否定之否定”:社会史与政治史关系探究》,《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李剑鸣:《隔岸观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李剑鸣:《美国政治史的衰落与复兴》,《史学集刊》2013年第6期。

转引自庞卓恒:《西方新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58页。

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张国刚:《独立与包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略说》,《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王海光:《时过境未迁》,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5页。

见杨念群、黄兴涛、毛丹:《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杨凤城、辛逸、董佳:《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6年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陈志武、龙登高、马德斌:《量化历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⑩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1、32~33页。

^⑪裴宜理:《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阎小骏译,香港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页。

^⑫《毛主席去安源》的画面处理浪漫、庄严而极具宗教气息。作者刘春华说他的创作灵感一部分来自拉斐尔的宗教画,安雅兰说这幅画“明显含有奉献精神的感召力”,以至于一位意大利艺术家摹仿此画绘制了一幅作品,配以“年轻的中国传教士”的文字说明,悬挂在罗马梵蒂冈教堂长达几个月,直到发现原画的真正出处才被移除下来。见

裴宜理上书,第193~194页。

⑭阿尔蒙德、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策略》,曹沛霖、郑世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⑮裴宜理为阎小骏《中国何以稳定:来自田野的观察与思考》一书所做的《序》,香港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4~5页。

⑯史天健:《中国人的民主价值观实证研究报告》,见玛雅:《当代中国思想界国是访谈录》,香港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39~160页。

⑰⑱保罗·皮尔逊:《时间中的政治——历史、制度与社会》,黎汉基、黄佩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2~13页。

⑲乐美真口述:《〈金门协议〉签订的台前幕后》,载《联合时报》2010年5月10日(乐美真时任国务院对台办公室副主任,两岸红十字会金门会谈中大陆方负责人)。http://www.shsx.gov.cn/node2/node4810/node4851/node4864/user-objectlai40744.html。

⑳托马斯·埃特曼:《利维坦的诞生》,郭台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23~26页。

㉑邹说:《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148页。

㉒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2页。

㉓⑳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124页。

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同上书,第110页。

㉕格尔申克隆:《对现代工业化“前提条件”概念的反思》,罗荣渠:《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

㉖林尚立:《大一统与共和: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复旦政治学评论》第16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㉗金大陆:《关于“票证时代”的集体记忆》,《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

㉘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㉙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0~115页。

㉚菲利普斯·夏夫利:《政治科学研究方法》,新知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8~27页。

㉛裴宜理、陈红民:《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8、220、222、234、1页。

责任编辑 陈亚飞

(上接第61页)

⑳ David Held, Daniele Archibugi.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㉑“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考虑到环境问题的历史成因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困难,在制定环境保护政策时对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义务分别进行规定,并规定发达国家有先行履约、对后发展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的责任。参见万霞:《“后京都时代”与“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外交评论》2006年第4期。

㉒《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41条规定内陆国家拥有与沿海国家平等的海洋公域使用权和开发权;第140条规定应对发展中国家,及当前尚未取得独立但依联合国宪章予以认可的国家的利益和需求予以特殊考虑。在《公约》的实践中,第140条以划定“保留区域”的方式得以执行:一些区域以“位置银行”的形式被保留下来,留待今后供企业或发展中国家之用。参见 Franzese, Patrick W. “Sovereignty In Cyberspace: Can It Exist?” *Air Force Law Review* 64, (June 2009): 1~42.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EBSCOhost (accessed February 9, 2017)。

㉓“千年发展目标”第8条规定的扶助内容包括金融工具和通信信息技术的普及、出口特惠、债务减免、创造就

业、提供廉价基本药物、官方发展援助等。

㉔叶江:《“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及对2015年后议程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5期。

㉕如在海洋物种资源的开发问题上,技术发达的国家认为此类资源应开放使用,而发展中国家认为它们不能被分派给主权国家,而应建立一套国际机制来保证各国从中获得平等的经济利益。

㉖联合国安理会于2017年3月17日通过《阿富汗局势》决议,首次采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措辞。参见 UN: Resolution 2344 (2017), 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RES/2344 (2017)&referer=http://www.un.org/zh/sc/documents/resolutions/2017.shtml&Lang=E。

㉗郭辉:《试论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思想与文化》2010年第00期。

㉘⑳池田大作、汤因比:《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80、284页。

㉙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02版。

责任编辑 陈亚飞

ownership types. Further study showed that the privatization reform in deregulation is beneficial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enterprises productivity. The difference above is not entirely caused by the deregulation reform, but also affected by the common trend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he paper discovered that the privatization reform in deregulation has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scale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inhibits the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through competitive effects. This paper holds that keep opening up and strengthen regulation reform is still the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urban water supply industry in China.

Key words: deregulation; enterprise TFP; privatization reform; crowding-out effect

The Subject Field and Problem Consciousness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History (43)

Chen Mingming

(Political Depart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history reflects on the 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s. It not only absorbs theoretical and academic resources regarding the two disciplines, but includes the merits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leading to positive prospects on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 analysis on the discipline context, research prospective and problem consciousness of the study has been conducted in the paper, in aspects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norms and experience, cultures and power, time and structure, logic and proof.

Key words: political history; cultures; power; time; structure; logic; proof

The Value Foundation of Future World: Nationalism or Cosmopolitanism? (54)

Ying Chen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2)

Abstract: The fact of Globalization requires constructing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 global perspective. However, nationalism still impedes the progress. Nationalism as an ideology was born out of a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functioned as escalating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expanding civil rights, and integrating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Nevertheless, nowadays nationalism does more harm than good. As a result, i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develop “love to the compatriot” into “love to the mankind” rather than set them against each other. Cosmopolitanism has its ideological origins synchronous its respective strength and weakness in bo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Kant, as the representative for modern cosmopolitanism, devised a tentative scheme for perpetual peace. The scheme has been applied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ut not progressing smoothly. The initiative and practice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Western and Eastern civilizations. Creat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constructing the value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especially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populism has caused a severe chaos in a world-wide range. Meanwhile, in order to reach a consensus, it is necessary to seek for common ground and comparabilit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global governance; nationalism; cosmopolitanism;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ow Does Civil Law Face Public Law?—Concept Updating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 (62)

Huang Zho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Abstract: The coordination of public law norms and private law norms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code of civil law. Harmoniza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law not only needs to build some specific systems, but also needs to update the concept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 The dualism understanding about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 not only splits the relation, but also creat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m. The superiority theory of public law can realize the consistency of law and conform to the idea of individual independent responsibility, but it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situation of China and realize the realization of basic rights. The unity of the law order cannot be understood rigidly, but should be understood in